

論文文的工農兵方向

——「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著 董 雲



一九四八年五月·光華書店初版發行

論文藝工作者的方向

——讀「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著 葦 雪

新華書店發行

論文學的工農兵方向

著者 雪葦

出版者 光華書店

發行所 光華書店

各地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LUN WENSHIO DE
GUNGNUNCBING FANSHIANG
SIOE WEI ZHU

一九四八年四月

在大連印造

初版發行三千冊

論文學的工農兵方向

——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目次

新文學的歷史說明什麼·····	一
文學寫作的方向問題·····	壹
文學運動的方向問題·····	一七
讀『種穀記』（附錄）·····	一七
書後·····	二〇

新文學的歷史說明什麼

一

要明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究竟解決了什麼問題，在中國新文學的建設上作了如何貢獻，它裡面的觀點具有何等樣的正確性；首先得從中國新文學的歷史來加以考察。

那麼，新文學的歷史說明了什麼呢？

二

我國新文學的歷史，開始於民國六年即一九一七年的『文學革命』運動，首先發難的文章，是掲載於『新青年』雜誌上的『文學改良芻議』（胡適，一九一七年一月）和『文學革命論』（陳仲甫，一九一七年二月）。第二年（一九一八）五月，魯迅發表了

白話創作小說『狂人日記』（同載『新青年』），纔『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奠下中國新文學堅不可拔的戰鬥基礎。經過民國八年（一九一九）的『五四』運動，新文學得與廣大的社會革命力量相結合，獲取廣大群眾的支持和傳播，使其影響普遍全國。直到『五四』退潮，與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力量第一次發生分化和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獲得最初一步的發展同時，同樣的過程也在新文學的陣營裡進行。這樣，到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為止，結束了新文學的開創時期，即『五四』時期。

民國六年即一九一七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世界帝國主義重新瓜分世界的可恥戰爭之第四年，世界大戰使得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奪暫時削弱，遂有中國資本主義一時的向上發展；同時，更重要的是：此正處在二十世紀戰爭與革命的第一個週期，這一年（一九一七年），和我們有密切關係的俄羅斯，就在勝利的進行着驚天動地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接着又是歐洲各國革命高潮的到來。相同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第一次大覺醒，我國人民這時也開始了第一次真正從思想上起來的蘇甦，所謂『工農兵學商』，雖有不同的認識和不同的深刻程度，但都各自要求解除其被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套上的枷鎖。在這樣的國際背景和國內環境之下，我們文學革命運動的先驅者們，特別是以魯

迅、劉半農、錢玄同等爲代表的絕大部分，真爲鄭振鐸所說，他們是『紮硬寨、打死戰』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二卷『導言』）然而當時的領導思想（不是個別人的思想）究竟是怎樣一種情況，我們還應當弄個清楚。

五四時期建設中國文學的一般領導思想，當時所明確要求的是要建設一個『新』文學，一個用現代人的話（活人說的白話）來寫現代人的思想（活人的思想）的文學，反對用死人的話（文言）來寫死人的思想（封建思想）的文學；因此，在文學內容上，主張民主主義而反對封建主義，反抗儒家思想對文學的統治；在文學的工具——文字上，則主張白話文而反對文言文，反抗死文字對活文學的束縛；並要以這民主主義的文學取封建主義的文學『正統』地位而代之爲中國文學的正宗。這都是當時先驅者們的實際功績所在，不能湮沒的。可是，這新文學究竟如何『新』法，這『現代』是什麼樣的現代，那就十分朦朧：從『文藝復興』的文學到『世紀末』的文學，從資產階級革命的文學到資產階級沒落的文學，都是『新』的、『現代』的，都在歡迎之列。

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主要提出『八不主義』——

一曰，須言之有物。（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不用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不用對偶：——文須癡駢，詩須癡律。）

八曰，不避俗語俗字。

一、二、四條都是有關文學內容的主張，重要的則只是第一條。但他對『言之有物』的『物』是這樣解釋的：

『吾所謂「物」，非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也。吾所謂「物」，約有二事：

（一）情感 「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諸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謂情感也。情感者，文學之靈魂，文學而無情感，如人之無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

（二）思想 吾所謂「思想」，蓋兼見地、識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賴文學而傳，而文學以有思想而益貴；……思想之在文學，猶腦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則雖面目姣

好，雖能笑啼感覺，亦何足取哉？文學亦猶是耳。」

這裡，『情感』和『思想』都是只解釋得個名詞本身，此外就沒說明些什麼。過了一年多，民國七年即一九一八年四月，他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裡，不過把這『八不』概括成『四條』：『一，要有話說，方纔說話；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在內容上並沒有什麼進展。甚至於說，他『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換句話，他所着眼的就只『白話』兩個字。但是就連這個，也表現了很大的軟弱性。（註一）陳仲甫的『文學革命論』（一九一七年二月）在戰鬥的意義上蓬勃得多。他聲言：

『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然而主要只說明了應被打倒的一面，即是所謂：『此種文學』，『其形體則陳陳相因，

有肉無骨，有形無神，乃裝飾品而非實用品；其內容則目光不越帝王權貴，神仙鬼怪，及其個人之窮通利達。所謂宇宙，所謂人生，所謂社會，舉非其構思所及。」至於正面主張，幾止於寫出幾個口號。到第二年（民國七年即一九一八年）一月，在他寫的『本誌（即『新青年』）。——雪）罪案之答辯』裡，才更明白些說明：其所以要反對封建文

註一：我們一談到『五四』文學革命，總往往把胡適的作用作過分估計；其實，自始至終，他都帶着極大的改良與妥協的色彩，於實際上的貢獻是有限度的。胡適本人，雖然有種種的辯解，說：『我們認定文字是文學的基礎，故文學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問題的解決。……我們也知道單有白話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學；我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要有新思想做裏子。但是我們認定文學革命須有先後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嘗試集自序』，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八月）又說：『在那個貧乏的時期，我們實在不配談文學內容的革新，因為文學內容是不能懸空談的，懸空談了也決不會發生有力的影響。』（『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卷『導言』，民國廿四年——一九三五年九月）但是也承認了，他所努力的只是一個文學『文字工具的革新』。自

學，是爲了擁護科學和民主：

『要擁護德先生（民主），便不得不反對禮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賽先生（科學），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但也就止於這裡了。周作人底『人的文學』（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新青年』五卷六號），是被大家公認爲五四文學革命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胡適在『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卷的『導言』裡，還說『這是篇最平實偉大的宣言，它的詳細節目，至今（一九三五年）還值得細讀』的，可見確是足以代表當時一般領導思想的最高水平了。這裡確也乾脆的提出了問題：『我們現在應該提倡的新文學，簡單的說一句，是『人的文學』。應該排斥的，便是反對的、非人的文學。』不過也止於解釋出個抽象籠統的原則：

『我所說的人，乃是『從動物進化的人類』。其中有兩個要點：（一）『從動物』進化的；（二）從動物『進化』的。』『人的理想生活，……首先便是改良人類的關係，須營一種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用這人道主義爲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

便謂之「人的文學」。」

文學是被安置在現實的人生社會上面了，但是沒有具體的方向，對我們這時代、這社會以及社會裡的這些「人」，都沒有具體的認識。這就是「五四」先驅者們的一般限界。所以運用到寫作實踐方面，就把一切都當作「材料」，只要是社會上存在的都行；也不要什麼立場觀點，只要是從「實地觀察」得來的都對。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

然，如果他不是倒果爲因，認爲文字是文學的基礎而不是認爲思想是文字的基礎的話，他也許當時會多做出一點事情來吧。但是還應指出，僅是這一文字工具革新的問題，他的主張也非常之薄弱。比方，「八不主義」中的「不用典」一項，先是自己把「典」分成廣狹二種，而被他認爲「廣義」的典就有五種：「（甲）古人所設譬喻，其取譬之物，含有普通意義，不以時代而失其效用者。（乙）成語。（丙）引史事。（丁）引古人作比。（戊）引古人之語。」都是「非吾所謂典也」的；剩下來的「狹義之典」，又分工拙，而「工者偶一用之，未爲不可」。（以上均見『文學改良芻議』）真是如李何林所說：「這樣一來，直把不用典變成爲不是反對用典，反而主張用典了——用典須工，拙者當痛絕之。」（『近二

論『裡就是這樣說的』

「收集材料的方法 中國的「文學」，大病在於缺少材料。那些古文家，除了墓誌、壽序、家傳之外，幾乎沒有一毫材料。……至於近人的詩詞，更沒有什麼材料可說了。近人的小說材料，只有三種：一種是官場，一種是妓女，一種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會（留學生、女學生之可作小說材料者，亦附此類）。除此以外，別無材料。……我以為將來的文學家收集材料的方法，約如下：

（甲）推廣材料的區域 官場妓院與離離社會三個區域，決不夠採用。即如今日的貧民社會，如工廠之男女工人，人力車夫，內地農家，各處大負販及小店舖，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學上佔一位置。並且今日新舊文明相接觸，一切家庭慘變，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適宜，……種種問題，都可供文學的材料。

（乙）注重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 現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關了門虛造出來的，或是間接又間接的得來的……。真正文學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實地的觀察和個人自己的經驗」做根底。不能作實地的觀察，便不能做文學家；全沒有個人的經驗，也不能做文學家。

（丙）要用周密的理想（想像）作觀察經驗的補助……。

這樣的情況，直到第一次發生新文學陣營內部的分化為止。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及新文學運動的第一個分化內容，就是激進的革命知識分子更激進，更加革命化；而改良派則趨於和舊勢力（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勢力）妥協，離開革命陣，甚至于反革命。這結果，在政治領域裡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民國十年即一九二一年七月）；在文學領域裡，就其所代表的思想意義來說，則是『文學研究

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四〇頁）當時錢玄同也就對之提出過異議，認為胡適是『未免依違於俗論』，而主張：『凡用典者，無論工拙，皆為行文之疵病。』（『關於文學革命的兩封信——一、寄陳獨秀』）再如『白話』問題，他主張的白話，實是百年以前的書本話，即從『水滸傳』等小說學來，並非活人的口語；對於這個『今日的白話』，他只給予一個『補助』的地位。所以他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裡說，『我們可儘量採用『水滸』、『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的白話；有不合今日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話來補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來補助。』倒是傅斯年在『怎樣做白話文』（『新潮』）裡來糾正他，指出白話文必須根據現在活人的語言，而不是書本。

會』的產生。（民國十年即一九二一年一月）。中國共產黨，這個中國工人階級的參謀部，一開始就明確的爲中國人民訂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綱，以工人和農民爲骨幹，號召一切革命的階級團結奮起，並爭取與資產階級合作，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因爲這時帝國主義的分贓戰爭已經結束，其對中國的壓迫又『捲土重來』，外來壓迫的增加，反映在國內反動勢力的擡頭和封建軍閥統治的野蠻性上；『五四』群眾運動也開始退潮，潛入社會深處發展；同時，俄國十月革命已經勝利，並進行了頑強有力的國內戰爭，鞏固了蘇維埃政權，而這勝利是無產階級的勝利，勞動人民的勝利；這使得我國的勞動人民受其影響（首先是革命的知識分子），更加深其革命的覺悟。這樣，一方面是壓迫力量的加強，殘暴者更加殘暴；另一方面是革命力量的深入，進步者愈向前進步。這就是形成這次分化之內外背景。從這時起（一九二一），一直到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又發生第二次的更爲深刻的分化爲止，在政治上是大革命的準備和實行；在文學上，則與此步調相合，是新文學的第一個發展建設的時期，『文學研究會』的時期。在這裡，新文學之開創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在一般的領導思想上，得到一個進一步的解決。

作爲對『五四』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問題之解決，首先，是更明確化了時代和文學的關係，特別是時代和作家的關係。

『一個時代有一個環境，就有那個時代環境下的文學。環境本不是專限於物質的；當時的思想潮流，政治狀況，風俗習慣，都是那時代的環境，著作家處處暗中受着他的環境的影響，決不能夠脫離環境而獨立的。即使是探索宇宙之秘奧的神秘詩人，……就是並不提起他的環境，但是他的作品思想一定和他的大環境有關；即使是反乎他那時代的思潮的，仍舊是有關係。因爲他的「反」，是受了當時思潮的戟刺，決不是憑空跳出來的。』（沈雁冰：『文學與人生』）

其次，從這樣的理解出發，進一步肯定了文學是『爲人生』的，而且要改造這人生：

『……我們希望文學能够擔當喚醒民衆而給他們力量的重大責任，我們希望國內的文藝的青年，再不要閉了眼睛冥想他們夢中的七寶樓台，而忘記了自身實在是住在豬圈裡。我們尤其決然反對青年們閉了眼睛忘記自己身上帶着鍊鎖，而又肆意譏笑別的努力想脫除鍊鎖的人們，……』

巴比塞說：『和現實人生脫離關係的懸空的文學，現在已經成爲死的東西；現代的活文學一定是附着於現實人生的，以促進眼前的人生爲目的的。』國內的文藝青年呀，我請你們再三的思量巴比塞這句話！』（沈雁冰：『大轉變時期何時來呢』）